

《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一文及其两封信辨伪

唐天然

沈鹏年盗用“周作人生前回忆”之名编造的《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一文，在《书林》今年一月号发表以后，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陈漱渝同志，即撰长文，逐条辨析（见山西《晋阳学刊》）。陈文列出大量论据，证明沈鹏年的文章系蓄意伪造，颇具说服力。最近，又了解到，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四年曾经明确答复面询者，说他在五四时期见过不少名人，但没有见过鲁迅。这一事实进一步彻底揭露了沈鹏年伪造历史的丑行。本来，此案已真相大白，毋须赘言。但是，沈文中有些手法，陈文尚未指出；加之沈文所列“旁证”（说有些老干部生前曾作“毛泽东会见鲁迅”的回忆），复有两封“来信”刊于《书林》三月号，为之作证，而信中所述史实，又颇有补析必要。笔者因作此文，进行续辨。

沈鹏年是打着“鲁迅研究者”的旗号伪造历史的。他凭借掌握的一点资料，以假乱真，因之对其所引史料，均须认真查对，细心辨别，陈文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这里补析一条。

沈文开篇不久，有一段文字，是说周作人曾讲：“早在一九一七年，鲁迅对‘二十八画生’很关心。后来，鲁迅和毛主席是会过面的。”并说，为了说明鲁迅和毛泽东会见的来龙去脉，周作人从他在解放前写的一篇文章

谈起。接着便节引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子曰》丛刊第四辑上周作人的《红楼内外》一文。引文如下：

《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教员，积极的取攻势，猛烈无比。……《随感录》中又有一件逸事，不知那一期上登有一则署名“二十八画生”，这是后来非常知名的人物，姓名暂不便发表，只是三个字总算起来是二十八笔，所以他用了这别号，……

接着，沈文写道，周作人说：“因为署名别致，当时颇引起一些人的注意。鲁迅对二十八画生很关心，起因是看了他的文章。”以后，又铺陈大段文字，说什么周作人回忆，曾通过钱玄同向陈独秀打听到“二十八画生”原来是“湖南青年毛泽东君”；鲁迅因听陈独秀说毛泽东发表过《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而“面呈喜色”，“在寂寞中感到了慰藉”；鲁迅还要周作人撰文介绍毛泽东同志写的《民众之大联合》；以及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钱玄同来说，亲眼看到“二十八画生”慷慨演说，及毛泽东等代表被教育部次长接见等等。

细察文章脉络，作者是说周作人和鲁迅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已经知道“二十八画生”是“青年毛泽东君”了。可是，一查作者引用的周作人那节原文，不对了。沈鹏年在引

用这段文字时，玩弄了一个大花招。原来他仅截取周作人这段文字的一半，而故意删去了紧接在引文后面的话：

至于内容则已忘记，大概很是平常；总之不是谈社会主义的。这逸事恐怕知道的人不太多，我也还是在二十年前，偶然遇见疑古先生，听起才知道的，……

这段文字在陈漱渝的《辨析》中已经引出。他对前一句作了剖析，而后一句未作分析。

周作人在这里言之甚明：他所知道“二十八画生”即“毛泽东君”这件“逸事”，乃是在“二十年前”，即他写作《红楼内外》的一九四八年的二十年前，当为一九二八年左右。而且，还是偶遇疑古（即钱玄同）才听说的。这就是说，周作人直到一九二〇年四月，“毛泽东君来访”时，还不知道这位“毛泽东君”就是“二十八画生”。因此，情况非常清楚：沈文中占三分之二篇幅的所谓毛泽东同志和鲁迅会见的“来龙去脉”，什么听陈独秀谈，钱玄同来说，以及鲁迅如何如何，统统是子虚乌有，完全是沈鹏年以他的生花妙笔杜撰出来的。沈鹏年一面编造历史，一面又隐瞒史实真相（隐瞒还是为了编造），他就是用这样的手法来欺骗读者的。

沈鹏年为表示“实录”并非“孤证”，还提出了老干部张琼也“深知其事”。而不久，便有两封“来信”为之证明，说张琼及其爱人贺树确有回忆。现谨就“来信”辨析。

第一封来信是贺树学生所写。信中说，一九四六年十月，信作者和沈鹏年一起，两度往访贺树，贺树谈到，毛泽东同志曾经三会鲁迅：

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八年秋天；
第二次是在一九一九年农历年初二，北京大学开游艺大会，那天鲁迅来参加大会，我和毛泽东都见到了鲁迅，毛泽东还请鲁迅在休息时

到图书馆去坐了一会；第三次是在一九二〇年暮春，毛泽东将要离开北京去上海前不久。

贺树所谈三次会见，第一次并未提出任何根据。第三次即所谓在八道湾的那次，已经陈漱渝同志批驳。惟第二次，贺树讲述了具体过程，复查《鲁迅日记》，当天（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确有“午后同二弟往大学游艺会，晚归”之记载，需作辨析。

查《北京大学日刊》，这次游艺大会，系由校长蔡元培提议，北大学生会经办，目的是为画法研究会筹集基金，于旧历年初二、初三两日连续举行。游艺会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除演出话剧、音乐、击技等文体节目，还展出了北京各收藏家珍藏的宋元以来的名画，并附设灯谜（文虎）会。重要的是，游艺大会的会场是设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大学礼堂内。其时，沙滩的新楼（即红楼）已经建成，北大图书馆已从马神庙原址搬迁至此。《北大日刊》一九一八年十月就有该月二十二日图书馆全部迁至新楼办公和开放各阅览室的报导。而且，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北大日刊》第一版还刊有《图书馆主任布告》：

二月一日为旧历春节，二日、三日又为本校开游艺大会之期，自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图书馆各阅览室一律闭馆。初四日照常开馆，此告。

既然如此，鲁迅赴北大游艺会的当天，会场与图书馆不在一地，阅览室又全部闭馆，毛泽东同志焉能在短短的休息片刻，将鲁迅请到别一处，而又并不开放的图书馆“去坐一会”呢？此说显然不实。可见贺树之回忆不足凭信。

第二封来信是证明张琼同志“确实”“知悉其事”。信作者介绍说，他曾于一九七八年亲自为张琼整理关于毛泽东会见鲁迅的回忆录。但是，又表示，回忆者曾说因年代久远，可能不准；加之记录人限于条件，无法核实，

故具体内容“在此不一一细述”，“只能提供上述简单情况，供有关同志参考。”既来作证，又说供人参考，却不介绍具体内容，实在使人纳闷。

笔者最近有幸听到了张琼回忆的一些内容。据悉，张琼说，贺树生前对她讲过，毛主席与鲁迅曾多次见面。具体情节是：贺树一九一八年在北大旁听鲁迅的课，遇到以记者身份经常到北大的瞿秋白，并一起与鲁迅见面；毛主席也常去听鲁迅讲课，听到精彩处，常轻轻拍手；毛主席经常为鲁迅借书，还向鲁迅介绍马列著作；鲁迅在还书中夹过一张纸条给毛主席，邀请毛主席到他那里去；鲁迅曾向李大钊询问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小组学习的情况；鲁迅还赞扬毛泽东看问题充满辩证法，向贺树和瞿秋白多次夸奖毛主席，说他们今后至多是他的助手，并自信“眼力不会错”。鲁迅还勉励贺树：“希望在你们身上，你们年纪轻，没有负担，好甩开膀子打天下。”等等。

这篇回忆真可谓奇谈。它既与史实背谬，又完全不符鲁迅当时思想实际。鲁迅到北大任教始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一九一八年还未去讲课，因此毛泽东同志断无去听课之理。瞿秋白同志一九二〇年去苏联时，始为《晨报》记者，他当时跟鲁迅和毛泽东同志都不认识，鲁迅何以会向贺树和他“多次夸奖毛主席”？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非马列主义小组）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党成立后才公开，鲁迅何以会在一九一八年向李大钊询问“毛泽东学习的情况”？鲁迅当时接触马列主义著作并不多，又何以会用“充满辩证法”一

语赞扬毛泽东同志？而且，“甩开膀子打天下”这一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流行使用的语言，怎么可能出现于五四时期的鲁迅之口？诸如此类，实属荒唐可笑。这样的材料，岂能使人置信？难道还能用来作证？

我们还可以就沈鹏年的文章和两封“来信”作一番综合考查。这三份材料，本来是企图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同时证明毛泽东会见鲁迅这一件史实的。但三者之间，相互背谬，矛盾百出。有些问题，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比如，会见的次数，一说一次，一说“三次”，而另一说则为“多次”。会见的情节，也呈异说。尤其是两封“来信”，其原始材料，本系源出于贺树一人之口，不过一为学生所记，一系夫人回忆，而两者所反映的情况，却谬以千里，大相径庭，竟无一句相同处。再说访问的对象和时间，第一封信作者称，他所了解的情况，是和沈鹏年同访贺树所得，时在一九四六年；而沈文对此却完全回避，根本不提曾和贺树晤面，仅说系“实录”“周作人生前回忆”，时间则在一九六〇至六一年间，较前说推迟了十五年。（同访一事，究竟是信作者虚构，抑或沈鹏年健忘，个中奥妙，局外人当然无法知晓。）即从这一方面看，不也可以证明这些材料了不可信么。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一提。沈文以张琼回忆作证，可见作者深悉回忆内容。如前所析，张琼的一席讲话，荒唐无稽，只要稍有革命史知识的人，便不会轻信。而沈鹏年研究鲁迅有年，不可能不具备这点起码的常识，但他不择手段，拿来作证，却又语焉不详，故意令人不明底细，让读者上当。